

王

14

仿

子

出版文集

中国出版论丛



知凡》(胡吉群)。篇文章，就退后由《晓声》杂志加上编者说明登载于《四三事》。编辑同李知凡太太一起，李知凡太太》。年代到老的出版江泽民，李知凡太太》。读当无用处、知识越名越反动”而理论一下，出版社停业，杂志停刊，由于郭沫若强调总理而一封往，《文物》月刊和《考古》杂志首先在经济的幸运。读者发现新发现的《文物》杂志，像在沙漠里发现绿洲一样兴奋，连素来对考古不感兴趣的读者也举世闻名，弃走相告。杂志社的印制从“文革”前的四开印，独树到现在的开。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对杂志社特别关心的毛泽东主席下国际语言，包括陈列、宣传推销，经双方协商后，在上海生产出“中英法文对照”文稿出版社经

G23P.2-53
95-56

147475

王仿子出版文集



中国书籍出版社
·北京·



(京)新登字 008 号

出版人 洪忠炉

责任编辑 张清雅

封面设计 张守义

王仿子出版文集

WANGFANGZI CHUBAN WENJI

王仿子 著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 7 号)

邮政编码:100031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35 万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7—5068—0204—X/G · 92

定价:9.00 元

PDG



作者简介

王仿子，上海青浦人，1916年生。

1939年在湖南衡阳参加生活书店工作，以后曾在桂林、上海、香港生活书店，桂林救亡日报和香港孟夏书店担任出版、发行工作。1949年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印务科兼宣传科科长，1950年任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出版部秘书室主任，人民出版社经理室主任。1952年后历任出版总署计划科科长，出版处处长，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任中国印刷公司经理。“文革”后，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国家出版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出版协会第一、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顾问。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兼任《中国印刷》杂志主编，第三届理事长，第四届名誉理事长。

编 者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改革开放，发展非常迅速。不仅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历史上空前的，而且出版的总体质量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可以说，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具有全国规模的，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和音像等门类齐全的，编辑、印制、发行、物资供应、专业教育和科研各个环节相互配套的出版事业。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也已跻身于出版大国之列。

事实说明，出版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重要性越来越清楚。1983年6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出版工作日益成为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成为促进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成为向人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的重要桥梁。出版事业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出版事业的发展，要由经济、文化、政治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来决定，同时又为经济、文化、政治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服务。出版事业的状况如何，不仅是出版部门的局部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摆在我我们广大出版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以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出版方向，加快出版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更加有力地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认真研究新中国 40 多年来丰富的出版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规律，这是加快出版改革、发展出版事业的重要条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先后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曾经具体地影响和指导了一个时期的出版工作。虽然其中某些内容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总体上，不失为一笔反映我国出版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和研究当代出版事业的可贵资料。有计划地、系统地加以整理出版，对推进出版科研工作、从理论上总结出版实践经验，对加快出版改革开放、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都是有意义的。

基于以上认识，经袁亮同志建议，新闻出版署同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新闻出版报决定联合编辑出版《中国出版论丛》。计划选编建国以来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部分负责同志有关出版工作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一人一卷，计划 10 卷左右，两年时间完成。这套丛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首次编辑出版这类著作，一定会有不妥之处，希望出版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指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新闻出版报

目 录

上编(1976—1993年)

出版篇

开展合作出版一年间	5
改革促进出版繁荣和满足读书需要	15
编辑要关心书的命运	18
为出版改革进言	27
装帧艺术界的一个创举	30
编辑也是出版家	32
出版社不管发行工作的时代即将过去	50
谈谈出版改革的几个问题	54
做一个有良心的出版家	66
再谈图书定价问题	70
出版改革要借鉴历史经验	79
三谈图书定价问题 ——答复朱希同志	86
最令人忧虑的不是“低谷”	92
出版,不可迷失方向	94
“卖书号”与出版工作尊严	96
中日出版界的友谊之花	99

切实保障著作人的劳动报酬	101
出版工作与保护目力	104
比利润更重大的目的	107
版税制合理性质疑	109
“烧饼铺老板”又来了	114
出版社是企业,又不同于工业企业	116
“1958年前我国实行版税制”辨正	120
书价与社会效益	133
两种书稿报酬办法的比较	136

印刷篇

关于印刷工作的通信	143
新中国印刷业概况	149
新中国印刷业三十年	155
提高书刊印刷质量的一步	181
《中国印刷》发刊词	183
震动印刷界的一篇报道	185
书刊印刷的改革	187
关于筹建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	189
听了朋友的忠告之后	191
有计划地发展书刊印刷	194
发扬服务精神	197
更深地了解,更多地交流	199
有一点竞争好	202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命根子	204
给书刊印刷厂松绑	209

三点希望

——祝贺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成立	212
为促进印刷科技进步而奋力工作	215
质量与荣誉	217
祝贺与期待	220
海峡两岸的一次盛会	222
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224
三个第一	
——贺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创建 35 周年	226
继续合作,办好印刷函授教育	227
《中国印刷》十年	229
为印刷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服务	233
印刷现代化,关键在教育	
——贺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建校 40 周年有感	235

发行篇

倡议建立书市	239
关于建立联合图书发行机构的倡议	240
发行所代发,基层店选购	243
生活书店的门市工作	245
从一种图书销售方式说起	254
从一个省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说起	259
继承传统,改革创新	266

北欧图书发行工作见闻录	269
缓解“买书难”的若干设想	284
书店要为读者谋方便	291
不可缺少的窗口	297
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299
从“中间梗塞症”说到多渠道	310
关于图书发行工作答客问	318
重读《争取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324
赞“憨”劲	332
开架售书带来的“困惑”	335
读书人欢迎书市	338
优质服务与社会效益	340

纪念与回忆篇

我的良师益友	345
片断的回忆与思考	350
我与出版用纸 ——为祝贺出版纸张工作 35 周年作	356
我与文字六〇三厂 ——为文字六〇三厂创业 20 周年作	360
悼念沈良同志	364
追念徐仲文同志	368
人民出版事业的先驱者——胡愈之	374
我在人民出版社的经历	383
我在生活书店的经历	396
我在南方出版社的经历	410

生活书店门市工作的特色	
——为纪念徐伯昕同志而作	421
毕青的理想化的门市部	
——毕青同志逝世两周年纪念	431

下编(1949—1963年)

门市工作七十二条	441
掌握原则性,做好发行工作	454
读了《版权问题随笔》之后	457
关于书籍的装帧设计问题	460
必须进一步提高书籍装帧的水平	463
学龄前儿童读物的装帧	467
别忙“拉”稿	469
书籍的技术设计与节约	471
书的稿酬与印数	476
对于“敞开书架是否真正方便读者”的一些看法	
——与陈龙同志商讨	481



上 编

(1978—1993 年)



出 版 篇



开展合作出版一年间

(一)

与国外出版社搞合作出版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思想的产物。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物出版社与国外的出版社有过业务上的往来，如1962年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曾经为日本讲谈社出版《世界美术全集》中的三卷《中国美术》提供照片。1972年文物出版社恢复工作以后，又为讲谈社、平凡社、小学馆等出版社的《故宫博物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丝绸之路》、《中国陶瓷》等提供照片。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可能设想做现在这样的合作出版。

1978年底，在一次宴会上，日本讲谈社的一位负责人，在感谢文物出版社对他们的工作给以支持以后，直率地向我提出：希望今后建立直接往来关系，文物出版社提供的照片，讲谈社要直接付给报酬。接着，国家出版局转来南斯拉夫青春出版社要求合作出版的建议。1979年春天，平凡社邀请文物出版社访日，建议讨论两个出版社之间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商讨合作出版问题。

在这样几个出版社积极主动的倡议下，合作出版这个新鲜事物被推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从此，文物出版社与国外一些友好出版社的往来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1979年5月文物出版社代表团访日，与平凡社达成了合作出版《中国石窟》(16卷)的协议；12月，与青春出版社达成了合作出版《上海博物馆藏品》的协议。

对于合作出版，在这一年里，我们边作边学，在实践中对于国际间的合作出版摸到一些初步经验。最早是1978年冬，香港三联书店总处蓝真约我和高履方到广州商谈合作出版《敦煌的艺术宝藏》，这是文物出版社第一个合作出版协议。以后，除前面谈到的两个协议外，与日本讲谈社达成合作出版《中国博物馆》丛书协议。还和日本小学馆、同朋舍、美国、英国的出版公司商讨过合作出版问题。

(二)

为什么要搞合作出版？

通过合作出版可以得到外汇，但是，取得外汇不是我们合作出版的唯一目的，而是合作出版的成果之一。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出版事业，尽快改变目前书刊品种少，出版周期长，印刷技术落后的状况”。这个报告，为当前的出版工作提出了总任务，为我们确定了奋斗目标。我既感到鼓舞，又深为惭愧。建国30年了，我们的出版工作还是处于“品种少”、“周期长”、“印刷技术落后”的状况。特别是文物图录等大画册的出版，品种更少，周期更长，远远不能适应文物考古战线专家、学者和一般文物爱好者需要。如何“尽快改变”这种被动落后状况？我想，通过合作出版，利用国外现代化的印刷技术和物质力量，为我们增加出书品种，加快出书速度，是可以使用的一种方法。

为了使合作出版成为增加出书品种、缩短出版周期的一种手段，与当前出版工作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当我们与外国出版社商谈合作项目时，我们首先抓住长远出书规划中本头大、印刷要求高、急于出书的选题。至于对方提出来的项目，要看是否符合我们